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地方历史文献 与区域社会研究

Difang Lishi Wenxian
Yu Quyu Shehui Yanjiu

地方历史文献解读
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梁洪生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地方历史文献 与区域社会研究

Difang Lishi Wenxian
Yu Quyu Shehui Yanjiu

梁洪生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梁洪生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8727-2

I. ①地… II. ①梁… III. ①地方史—文献—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K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141 号

策划编辑 王 茵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王有学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

文化进程总是和经济发展同步。

岱岳齐鲁的富庶，孕育了孔孟诸贤；中原大地的繁华，造就了三晋英豪。关中的沃野千里，更营造出汉唐雄风。

尽管徐孺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自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西尚为“蛮荒之地”。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应是江西的意外之喜，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而且，将“徐孺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行进。

唐中期开始发生的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国内的交通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的改变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① 本来夹在吴楚文化之间，说是“吴头楚尾”却既非吴又非楚的江西，在这个时期超越“荆楚”，与

^① 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笔者《江西通史·明代卷引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另见许怀林教授《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吴越”一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又与“湖湘”共同构成中国最稳固的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当人们正为晏殊父子蜚声词坛而钦羨、为欧阳修独步文苑而仰止、为王安石策划国是而疑惑之余，更加惊讶地发现，后面接踵而至的，竟然是长长一列的一流文化人：曾巩、黄庭坚、陆九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文天祥、马端临、吴澄、朱思本、周德清、解缙、杨士奇、吴与弼、罗洪先、魏良辅、颜钧、何心隐、汤显祖、朱耷（八大山人）、蒋士铨。当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江右文化大军，连同着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江右王门以及《文献通考》、《岛夷志略》、《广舆图》等等，密集而持续地产生影响时，怎么可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文章节义之邦”、“家孔孟而人阳明”之美誉遂纷至而踏来。^①

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层面的支持。“淡水浸铜法”、《禾谱》、《茶经》、《陶录》，特别是《天工开物》，既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启示。丁文江院士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后，解释了当年身为“县学教谕”的宋应星竟然能够编著《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原因：“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②

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江西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前后五百年间，数百上千万的江西人口涌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成为持续影响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他们在这里开垦荒地、发掘矿产、交流物质、传播文化，与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移民和土著居民一道，造就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然遗存的几百处江西会馆（万寿宫）、临江会馆（萧公庙、晏公庙）、吉安会馆（文公庙）、抚州会馆（昭公祠）、药帮会馆（三皇宫）……见证了当时的辉煌。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因收缴“伪书”发布“上谕”：“江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哲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0《朱子建宁门人并交友》。

② 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载武进陶氏编《天工开物》。

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①可见直到此时，江西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文化发达之域。

但也就在此时前后，江西缓慢了自己行进的步伐，不仅落后于吴越，且开始被湖湘赶超。特别是“五口通商”及京汉、粤汉铁路开通之后，国内交通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大运河通航以来的根本性变化，江西从交通格局的“中心”被甩到了“边缘”。从外部涌入的新思潮、新风尚、新的生产方式，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致使江西在理念的更新和经济的转型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交通格局中的边缘化以及理念转换、经济转型的迟滞，直接导致了江西近代文化的落后。

虽然在20世纪，仍然产生了陈寅恪、吴有训、傅抱石这样伟大的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但从整体上来说，江西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一样，相对一骑绝尘的吴越、早已国门洞开的闽粤，以及民风大开的湖湘，其封闭与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

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成为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也是江西在抗日烽火中给全国展现的文化曙光。

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为学校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

虽然校长对于学校远景的描述不无鼓舞人心的苦心，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它的感召下，大批江西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历史系也是人才济济，他们之中，有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卓尔不群的逻辑学家吴士栋，有梁启超先生的高足、著述等身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有清华十人史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兵制史和经济史家谷霁

^① 《清高宗实录》卷1304，乾隆五十三年（1788）。

光,有对学术一丝不苟、锱铢必较的度量衡史和秦史专家谢康,有追随西南联大南北奔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明清史专家欧阳琛等。他们以自己的文章气节,开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和献身社会的人文精神。

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胡先骕校长为学校描绘的远大前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学校发展屡经曲折,名称也几番变更:始由国立中正大学改名南昌大学(1949年),再经院系调整改名江西师范学院(1953年),最终定名为江西师范大学(1983年)。其间虽然不乏杰出学者和优势专业,但从整体上说,由“国立”中正大学而为“省属”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虽然是“省属重点”,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客观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边缘化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江西的一所高校、一个个体的边缘化,而是江西的高等教育、江西的文化事业,从晚清以来所经历的再度边缘化,其后遗症迄今没有消除。而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再度边缘化,对于江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但迄今同样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虽然如此,江西千百年来培育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依然在激励着江西师大的师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拥有三个校区、4400亩土地,融教育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及音乐、体育、美术等特殊专业于一体,有全日制本专科生近4万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近2800名,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发展正在显示出良好态势。

在迎来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既无博士点,也非教育部重点基地的历史学的学者们,仍然可以问心无愧地向校庆献上他们的贡献。

一方面,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今天江西的土地上,县级以上中学的高中部,每100名历史教师,有近70个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在江西的市县级博物馆馆长中,有一半以上曾经受训于江西师大历史系。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江西师大历史系为各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输送了近500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大批博士研究生。

另一方面,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索。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商品经济研究》,许怀林的《江西史

稿》、《江西行政志》，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梁洪生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梁民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邱新有的《村治中的宗族》等，都是集多年研究的力作。而11卷近500万字的《江西通史》的完成和出版，更集中展示了这个学术群体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江南腹地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大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在30多位专任教师中，有28人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京、津、沪、宁、汉、穗及其他各地高校，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潜心研究，形成了一支颇具声势的学术新军。他们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当然传人。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谢宏维《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士绅与地方政治》等著作的整体推出，既反映了这批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预示着这个学术群体由“单兵作战”到“集群作战”的进步。

三

在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这个学术群体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论文，结为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出版，作为向七十年校庆的一个汇报。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收录了方志远、陈晓鸣、谢宏维、温乐平等人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从具体的个案入手，对秦汉、明清时期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国家财政与地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

《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收录了万振凡、游海华、邱新有、戴利朝等人的 22 篇论文。这些论文以苏区革命为中心，分别对苏区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江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变迁进行讨论。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收录了张艳国、王员、刘劲松、蒋贤斌等人的 28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演变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度透视。

《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洪生、李平亮、游欢孙、廖华生等人的 14 篇论文。这些论文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解读，以江西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宋代以来区域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变化作出了新的解释。

《史学观念与欧美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民慷、张艳国、孟海泉、徐良、李昌新、杨长云等人的 20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欧美社会的史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代审视，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参照系。

这套史学文丛与建校 65 年选编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不同，前者试图展示本学科的学术传承，所以收录吴士栋、姚名达、谷霁光、谢康、欧阳琛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而今次所收录的，均为在职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学术境界、学术方法上的追求和进步。

论文的结集出版，其实是一件十分奢侈而艰难的事情。所以，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院之长和作者之一，当我承担写“总序”任务时，并没有太多的快感。

出版经费的筹措颇费周折，但方方面面的支持令我们感动。如果一一列举其中的友情和热情，反而显得客套和俗气。

主要的顾虑倒是，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有多少成果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磨砺？敝帚自珍的些许创见，投放于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长河之中，是否算得上是沧海一粟？

但是，沧海正是由点点滴滴而汇成，经典也是由平平凡凡而凝练。当这些点点滴滴汇入涛涛巨流，当这些平平凡凡融入传世经典，小我也就成了大我。设想，如果没有大批像江西师大历史学这样的非“985”、非“211”院校学者们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三十年历史学科的发展是难以想

象的。

徐孺子当年的影响力比起陈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徐孺子既没有因为身居“蛮荒”之地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陈蕃为其下榻而受宠若惊。而他的自尊自强、宠辱不惊，竟然成为此后江西文化、江西学术的核心品质。从这一点来说，王勃在《滕王阁诗并序》中的赞赏或许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讵知这批成果的结果出版，不会成为江西历史学振兴的前兆？

一念及此，稍稍心安。权作序。

作者谨识

己丑岁末

目 录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1)
----------------------	-----

地方历史文献解读

从“异民”到“怀远”

——以“怀远文献”为重心的考察雍正二年

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	(3)
-----------------------	-----

辛亥革命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

——读谱笔记三则	(43)
----------------	------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

——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68)
------------------------	------

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96)
----------------------------------	------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的转移

——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123)
-----------------------	-------

地方志叙事“小传统”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数量增长

——兼论 1929 年与 1934 年的“商业镇”与“自治镇”	(138)
---------------------------------------	-------

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

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

——以流坑村为例	(159)
----------------	-------

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

- 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 (190)

清代蚭城的约保 (205)

官府、士绅与庙学的修建

- 明清时期婺源庙学的个案考察 (220)

近代吴江自治区域的划分

- 兼论“区域江南”与“江南区域研究” (236)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宋元明清时期江西全真道发展述论 (261)

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习俗 (278)

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嬗变及其意义转换

- 江西吴城镇聂公崇拜的研究 (291)

后记 (323)

地方历史文献解读

从“异民”到“怀远”

——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
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

梁洪生

引言:寺田隆信“棚民”研究之检讨与 “怀远文献”启发的新思考

或许是因为比较晚才译成中文的缘故,1959年日本寺田隆信发表的《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一文^①,几乎没有进入国内研究清朝“棚民”(移民)的学者的视野。^②寺田在该文中,将“棚民”也作为“四民”以下的人群之一加以比较,所以才在“除豁贱民”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价值。与该文提到的几个贱民集团(如“乐户”、“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蜑户”、“伴当”、“世仆”等)相比,寺田无疑认为“棚民”的身份地位最高,肯定地说明:“至少在雍正时代,棚民不被看做贱民”,“雍正年间尚无把他们当贱民对待的记录”。他多处引用浙江、江西巡抚的奏折

①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国内学者研究江西棚民入籍及其对地方社会经济影响的文章中,比较重要的应提到刘敏《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万芳珍《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和雍正的朱批旨意,以及雍正九年准许已经入籍并符合条件的棚民参加科考等等,当说明“不是‘贱民’而是‘流民’”是雍正朝国家对这一人群的基本判定和态度。在这个层面上说,寺田是言之有据。而且,把“棚民”安置问题放到雍正个人关心的政策之一和被后人称颂的“善政”层面上,加以说明和评述,无疑是很开启思路的。事实上,将乾隆中期以后各地实施的“棚民”政策与雍正朝的比较,可以看到相当部分被继承和发展,而有一些逆转的方面,则更显示了雍正朝的创意。另外,应当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为“棚民”一类的人群划分不同的、地域性的户籍类别方面,雍正时期是最丰富多样,最有特色的,表现出整个国家管理层面一些新的思考和作为。如果说清王朝在“棚民”政策上开创过一个新阶段的话,无疑应从雍正朝算起。

然而,寺田又将这种认识推及“社会的”层面,认为“雍正帝在位期间,棚民在政治上也好,在社会上也好,都未被视作贱民”,“这些棚民自最初入籍于移住地,即与当地入相交际,并且负担税役,他们绝不会被视作贱民”,则显然缺乏详确的论证,并且将“棚民”的移入、入籍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负担税役等这样一些复杂的过程和相关的条件都简单化了,以至于得出一些很值得商榷的结论。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寺田认为“棚民”中还有一部分人逐渐变成了贱民,并最终在《清国行政法》中被视为贱民之一。寺田对此论述颇详:

在同样称为棚民的移住民之中,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没有融进本地人之间,流移于一般社会之外,占据着各州县靠山的土地,一面栽培麻、靛、烟草、香料等,一面烧炭、造纸等为生。此种棚民即搭盖小屋之民,其名来自其生活样式,他们和本地人的距离有渐渐变大的倾向。

本地人对他们不能认为是友好的,纷争的原因当然也有本地人方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类似的纷争及习惯的不同等,成为扩大两者距离的最初的主要原因。人们对棚民的看法,除天生的贱视外,又加上山间流民不得已的生活贫困和火田耕作法一类的低下的生产技术等,这些看法加速着对棚民的另眼看待,渐渐导致产生一种贱民。

寺田认为土著居民对这种“棚民”有“天生的贱视”,再加上因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歧视等,使之于清末变成了完全的贱民。因而

寺田最后在评价整个雍正朝除豁令的意义时，认为其只停留在户籍方面，不仅“在将堕民、蜑户等贱民们从其贱业中解放，并编入社会基本阶级关系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而且“作为新贱民的棚民，却正在渐渐形成”，所以“对于其之社会影响也只能给予否定的评价”。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是（或如何界定）“棚民”的问题。为此，很有必要提到香港学者郑锐达新近的研究成果。

1997年，郑完成题为《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地区研究》的论文，首次以一个区域和家族为个案，考察了袁州府萍乡、万载等县的“棚民”如何入籍、科考并逐渐产生出地方精英的过程。其中说明清初“棚民”如何“顶充”旧户，通过附着于土著的户口和图甲体系中纳粮承差；而到清中叶，袁州诸县“客民”屡次要求另立新图而未获准，万载县“棚童”考试卷面上无论注明“客”或“棚”，意义是相同的。该文无疑是至今研究赣西移民最翔实而富有说服力的案例^①，作者不仅注重使用了谱牒与祠志等资料，而且先从分析的理论入手，参照了有关学者关于户籍、图甲组织对于移民在土地、科举方面的意义以及对地方社会中不同社群间权利的划分和社会位置的界定的研究，其中引用了 Honig 研究上海“苏北人”得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即“苏北人”来源地很分散，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对“苏北人”的身份认同。所谓“苏北人”是上海原住居民及地方精英对来源分散的江北移民的一种族群标签，以界定原住居民的身份，明确划分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一条他、我的界线和阶级界线，并达到贬抑和控制外来移民的目的。郑文在理论上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纠正以往研究者的一个常见缺陷，即基本上都接受文献中从经济活动或生活形态的角度对“棚民”的解释，把“棚民”视同山区的移民，而且无论在活动范围、经济活动及生活形态各方面都是与土著清晰的分开来的。客观地说，郑的这种认识还得益于他两次来江西做田野调查的经验。一次是边远的山区，另一次则在离萍乡不远的丘陵地带，而且这一地区的移民家族精英最终成为地方著名的绅士，并主修了民国初年的地方志。而如果研究者只用文献资料，哪怕是地方志资料，也同样会陷入一个因由来已久的正统观念歧视所造成的认识陷阱，即棚民=进山=种蓝

^① 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郑锐达1997年7月硕士论文（打印本）。以上引述的内容，载此本第73—84、102—127页。